

门

夏目漱石著



门

〔日〕夏目漱石 著

吴树文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夏目漱石
門

本书根据角川文库《門》1966年11月版译出

門

〔日〕夏目漱石 著
吴树文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136,000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3,000册

书号：10188·560 定价：0.82元

重压的苦恼

——论夏目漱石爱情三部曲的《门》

痛苦、阴暗的格调

任何一个作家都特别注意给自己的小说安排上一个最好的名称。或者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小说的思想内容，或者为了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或者为了纪念某人某事。而夏目漱石中篇小说《门》的名称，却不是他自己设想的。

《门》连载于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年）三月一日至六月十三日的《朝日新闻》上，凡一百零四期。在连载之前需要发个预告，夏目漱石便让他的弟子、作家森田草平给小说考虑一个题目。森田找著名评论家小宫丰隆商量，他们从哲学家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一书中找出“门”这个题目。广告刊出，题目也就定下来了。

《门》和《三四郎》、《后来的事》构成了夏目漱石的“爱情三部曲”。《门》是其中的最后一部。“爱情三部曲”是漱石中期的重要作品。

《三四郎》描写了蓬蓬勃勃、一身朝气的大学生和年轻貌美的女学生美祢子的恋爱故事。相爱虽然倒也真诚、缠

绵，但到头来新女性还是向世俗低头，和她不相称的人结了婚。《后来的事》的主人公长井代助比起三四郎要成熟得多了，但在婚姻问题上也不顺利。他原本和三千代相爱，不料好朋友平冈插了进来，向他陈辞一番，他出于豪爽和义气，便把三千代让给了平冈。日后，老朋友再次见面，代助发现对方是个堕落的哥儿，三千代并不幸福。这时，颇有钱的父亲给代助找了一家“门当户对”的亲事，代助当然不喜欢。对三千代的同情和怜悯，使代助重新燃起了爱情之火。过去对朋友的侠义，致使代助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现在虽然爱着三千代，却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

《门》在很多方面是《后来的事》的继续。男主人公野中宗助，女主人公阿米，他们和《后来的事》的主人公长井代助、三千代虽不同名，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长井代助爱上了朋友的妻子三千代，野中宗助爱上了朋友的妻子阿米。代助和三千代没有实现的事，宗助和阿米却实现了。

他们冲破闸门，结婚了。婚后六年多，他们一直是“情投意合的夫妻”，关系越来越好。但透过两人的幸福之幕，我们可以看到笼罩在两人头上的沉重阴云。如果说《三四郎》、《后来的事》的主人公还充满了朝气和爱的活力，那么在三部曲最后一部的《门》中，却充满了阴暗、忧郁和孤独的气氛。打开小说的第一页，读者就会被宗助和阿米的孤寂和贫困所吸引。这也是小说的基本调子。

宗助和阿米好象被抛离了人世。除了买衣、买米，和社会没有来往。他们的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之感纠缠着他们。

和别人的妻子相爱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残酷的命运出其不意地给无罪的两人以沉重的打击，他们被半开玩笑地推入了陷阱。

随着时光的流逝，苦日子虽然没有变，但可怕的打击是过去了。就在这时，宗助突然听房东说到那个遭到打击的朋友安井已回到东京。经过两三年才渐渐愈合的伤口再次破裂，烈风无情地吹进来。宗助很怕见到昔日的友人安井，他曾想把这事告诉妻子阿米，但是没有说出口，他想从宗教中得到解脱，就借口外出休养，去镰仓禅寺坐禅去了。参禅十天，始终没有入门，只好忧心忡忡地归家。但他了解到朋友已经离开东京、阿米也不知道这件事之后，才松了口气。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只不过是暂时避开了风暴，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阴云并没有散去。阴暗的压迫也不能轻易解除。

沉闷、忧郁、阴暗、痛苦，这是小说《门》的基本格调，也是和前两部小说截然不同的地方。

重 压 之 苦

小说主人公相爱虽深，却也寂寥、孤独、苦闷。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我们可以看到沉重的镣铐对他们的双重压迫。

一个是来自社会的直接的压迫和欺骗。宗助和阿米的社会地位，充其量不过是下层知识分子。宗助出生在有钱人家中，他曾挺步勇进，受过高等教育，很多朋友围着他转，

前途无量。他有父亲的引荐，有父亲朋友的帮忙，他大学毕业后的前途充满了光明。

但这时他的生活之路发生了骤变。他和好友安井的妻子阿米产生了深深的爱情，两人终于背离安井，结婚了。

和别人的妻子相爱，在人们看来，这是不名誉的、不道德的、不规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社会舆论的攻击很凶狠。他们不得不在世人舆论的重压下退下来，过着生活在社会、却与社会无涉；生活在城市、却与城市无关的寂寥而贫苦的生活。因为社会老跟这对夫妇作对，使他们遭受冷遇。他们实际已经屈从于社会道德的压力，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宗助有时甚至觉得：同那些大人物相比，自己不是人类。

但是权势和财力的力量要比社会舆论的重压更狠，在阶级社会里还有什么能比得上权势和金钱呢！宗助的父亲逝世时曾留下一笔遗产，但还清债务后，所剩无几了；留下一座房产和一些古董，又被利欲熏心的叔叔吞没。宗助实际上一贫如洗。叔叔死后，给宗助的弟弟提供学费的诺言也不存在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失去财产权，就必然掉进苦海。

宗助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贫苦知识分子的写照，他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只能靠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一旦被解雇而失去工资，那就非同小可了。小说很生动地展示了在公司裁员中，象宗助一类小知识分子的时喜时忧的心理状态。他被留用了，长了点工资，虽谈不上有什么了不得的改善，但比起那些被裁减的可怜者，宗助庆幸不已。他跑到

阿米跟前，没头没脑地说：“这下可好了！”现出一脸滑稽相。与其说这是庆幸，倒不如说这是在担惊受怕中喘了口气。读者可以从中感到工资微薄的下层职员的辛酸。

在小说里，来自社会的直接重压（舆论、资本家的叔叔、公司）并不是作家描写的主要方面。小说着重描写的则是宗助在思想上所遭受的惨重磨难。舆论斥责他不道德、不名誉、不规矩的话固然可怕，更可怕的则是他本人和他的妻子阿米所背着的“罪人”的十字架。也就是说，他们本人也认为自己是背叛朋友的、不道义的“罪人”。

宗助和阿米的结合，确实是损害了朋友安井，但是不是“罪人”呢？是不是“不道德”的呢？

从小说的描绘可以看出来，这是连夏目漱石也不同意。宗助的朋友安井是个浪荡公子，爱游游逛逛，把女子阿米带到京都，第一次向宗助介绍时，说阿米是“我的妹妹”。夏目漱石对这个人物的描绘很简单，也很含蓄。

后来宗助对阿米产生了爱情，阿米也常来找宗助。他们的结合并不是不合逻辑的。夏目漱石说他们是两个无罪的人。

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中，妇女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家庭和夫权的陈旧观念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在当时的日本，妻子只能是家庭里的忠实仆人。宗助和阿米的相爱，乃是冲出封建家庭桎梏、反对夫权压迫的果敢行动。

小职员宗助和家庭主妇阿米的头脑中还不可能摆脱千余年来旧习惯势力的影响。他们的关系使他们的一生涂上

了阴暗的色彩，生活里总有个幽灵在时时徘徊，给两人的精神上带来压抑。他们知道，在他们内心深处潜伏着人们所看不见的恐怖，就象结核病灶一样。当他们听到安井受不了离异的刺激而跑到满洲去，后来又回到蒙古时，他们就觉得这是自己的“罪过”造成的。尤其是听说安井已回到日本，很可能会见一次面时，宗助更加紧张了，“罪行”和“过失”紧紧尾随住宗助。头脑里的这种旧思想成了长期折磨他们的一条毒蛇，越摆动就缠得越紧，一天天、一年年，折磨了六年之久。宗助和阿米在痛苦中受煎熬，这完全是出自他们自己做人的良心。

阿米和宗助的结合，作为妇女来说还有更悲惨的一面。阿米深深地爱着宗助，不畏贫贱，同生共死。但是她的可贵的爱情遭到了可怕的报复。她和宗助连个孩子也没有。阿米三次怀孕，三次没有成功。第一次是流产，第二次是婴儿生下五天就死了，第三次却因生产时脐带缠在婴儿脖子上，把孩子活活缠死了。这时阿米立刻想到：自己确实确实犯了大罪的坏蛋。她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不可想象的道义上的苛责。占卜者说她做过对不起人的事，罪有应得，决不会生孩子。阿米听后，一下子病倒了。小说在结尾处暗示她的身体已坏到极点。对一个女人来说，恐怕没有比不生育更苦恼的了。

夏目漱石的洞察力是很深刻的，他一方面从社会关系中描绘了宗助和阿米所遭受的冷酷、压迫，另一方面又从精神世界和灵魂深处揭示他们所遭受的种种苦恼和折磨。

这是和明治后期的社会情况很有关系的。当日本帝国主义战胜俄国而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之林时，它是靠盘剥本国人民和被压迫的其他国家的人民来求得生存的。在到处充斥着“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宗助的朋友安井跑到了满蒙，房东称他是“冒险家”）的叫嚷中，在到处高喊着“天皇万岁”的情况下，社会道德也必然是卫护专制和私欲的。宗助和阿米正是这种社会环境下的奴仆和牺牲品。这是当时日本下层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剧。

夏目漱石的道德观

宗助的典型意义不只是描绘了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夏目漱石的爱情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小说《门》中，主人公的苦恼达到了顶峰。紧张的思想探索成为小说的核心部分，这意味着夏目漱石在小说的人物命运之外，进行着一种新的精神之路的探索。

第十四章是《门》这部小说的重要部分，是整盘棋的“眼”。这一章在谈到宗助和朋友安井的妻子相爱而结合时说：“事情是萌发于暮冬初春时节，而结束于樱花凋零之时。自始至终都是殊死的搏斗，困苦得犹如炙青竹榨油。飓风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将两人刮倒。等到两人站起来时，四处都已被沙土所封。两人看到自身也被沙土所裹，但是两人都不知道自己何时被飓风刮倒的。”

这里的“飓风”是寓意很广的比喻，已经超过个人问题了。

夏目漱石是在本世纪初走上文坛的。他的长篇小说《我是猫》（一九〇五年），借猫的观察讽刺了世间的虚伪和道德的堕落。小说《伦敦塔》又把资本主义世间影射为幽闭世界的“口袋”。为了冲破这个“口袋”，他要寻找“一把锥子”。按夏目漱石的理解，个人的觉醒是冲破牢狱的最好武器。他的早期作品特别推崇“尊重道义的个人主义”（即个人觉醒）。在日俄战争后社会上流行盲目崇拜天皇及军国主义的时候，夏目漱石采取了背道而驰的伦理观。

爱情三部曲的《三四郎》、《后来的事》和《门》，是夏目漱石在《我是猫》之后，探寻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下去的心理作。生活、道德、现实、爱情、家庭以及社会等问题，在作者的头脑里迅速旋转。这三部小说描写了人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的变化，而爱情观只不过是道德观的一部分。特别是在《门》这部小说里，对社会的批判并不是作者要描写的主要部分，倒是对人的内心道德观的剖析和探索，成了最核心的问题。

小说在表面上是描写了爱情问题上的罪和个人内心上的苦恼，实际上却是夏目漱石对日本民族觉醒的一种剖析。旧的社会、封建社会虽已被摧毁，但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正直的人们应该怎样办？这个问题尚需解决。人间的新的不平等、罪恶和欺凌已层出不穷，理想的天地似乎还很遥远。

夏目漱石在谈到宗助和阿米时说：“他们未能得到神的保佑，也没有遇到佛。于是相依为命成为他们的信仰。他们同甘共苦，合二而一，绘出了自身的生活。”这里描写的正

是资产阶级道德和封建残余势力在拚命孤立正直的人们。这也说明，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善良的人们是被迫孤寂地生活在社会之外的。

夏目漱石在谈到宗助和阿米的苦恼时还说：“社会毫不客气地让他俩背上了不义不德的罪名。但是他俩在道义上进行良心的自责之前，不禁茫然若失，疑心自己的头脑是否正常了。……在呈现出—对可耻的男女形象之前，已先不可思议地呈现出—对不按逻辑行事的男女的形象。”

按小说这段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们的道德上的罪名是社会强加上去的。他们确实是无罪的人。他们自己也怀疑这种罪过。他们只是“不合理的男女”而已。

小说的主人公同社会绝少往来的隔绝状态以及他们相爱的无罪，是紧密相连的问题。夏目漱石的同情心有着明显的倾向，这说明作家对社会盛行的道德观是持批判态度的。

宗助和阿米是被社会所逼而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他们的房东坂井则是在世上生活得很顺利的人。他有一笔很大的地产，有一群围着父母转的孩子，在社会上四通八达，但他很愿意和宗助交朋友、谈心。他的书斋是一个“藏身洞”，一有烦恼就跑到这里，过一下与世无争的生活。他虽然有钱，其实很寂寥。连坂井这种尘世派也要寻求远离尘世的生活，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宗助和阿米远离社会漩涡的生活远比那些醉心于社交的人来得纯洁。

夏目漱石的追求个性自由、妇女解放、反封建性、反奴

役性的道德观，因宗助和阿米的困境，有了更深刻的显现。夏目漱石在《门》、《后来的事》和《心》等小说中，都强烈地表达了作家追求新道德观的愿望。但是夏目漱石承认主人公为“罪”而苦恼，也承认宗助和阿米的关系是“不合理”的，这就反映出了作家的局限和迷茫。

夏目漱石在二十八岁时曾到松岛参禅，但未果而归。他的这一体验已在宗助的形象中深刻地体现出来了。宗助在苦恼不可解时到镰仓去参禅，未果而归。这说明苦恼没能从宗教信仰中得到解脱。

但夏目漱石在晚年时，还是从宗教中寻得了解脱。他推崇“则天去私”这一从宗教信仰中净化自己心灵的方法。这也是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产生某些失望之后，转向东方而寻找到的归宿。

夏目漱石不可能从社会阶级关系去认识社会。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走向净化观的宗教信仰。

作为具有深刻洞察力的作家，夏目漱石的道德观是倾向下层人民，是反对有产阶级和专横统治的。在小说中，小职员宗助、阿米、小六是他同情的对象，而有产阶级的佐伯叔叔一家，是他摒弃的对象。小说谈到了当时内阁首相伊藤博文在哈尔滨遭朝鲜爱国者安重根暗杀的事件。宗助、阿米、小六对这一号外消息没有什么大兴趣，倒有不少批评的话语。宗助甚至作出这样的结论：大人物不论走到哪里，都带来骚乱，自己和这些人相比，简直不能相信彼此都同属于人类。宗助的这种看法其实也反映着夏目漱石的观点。

在小说里还可看到，夏目漱石对命运的偶然性十分敏感。他认为许多左右命运的大事是偶然促成的。宗助和阿米的相爱，被半开玩笑地推进陷阱，被猛地刮倒在地，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自己在何时被飓风刮倒的。夏目漱石对命运的离奇之苦，在小说里是有着很多描写的。这反映出他的哲学观只是从偶然性的角度去认识命运的可怕和难于预料。

小说《门》是夏目漱石探索明治以来的社会道德和悲苦命运的记录。他从感情、思想、内心和道德等方面反映了他的那个社会。他强烈地热爱个性自由，崇尚道德观。主人公的软弱性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某些局限。

吕元明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宗助先前就把座垫搬到廊尻上，逍遥自在地在向阳处盘腿坐了一会儿，又把手里的杂志丢开，横身躺了下来。天气好极了，真可谓秋高气爽。街上很宁静，所以行人从路上走过时的木屐响声清晰可闻。宗助曲肱为枕，视线掠过屋檐向上空仰望，碧空如洗。相比之下，自己身下的这块廊尻显得多么局促，而清空是何其广阔。偶尔碰上个星期天，能够如此尽情眺望清空，宗助觉得别有一番情趣。他蹙着眉头朝金光闪闪的太阳光瞅了一会儿，却感到很耀眼，于是把脸朝着拉门的方向翻了一个身。宗助的妻子正在拉门的里边干针黹活儿。

“噯，天气好极了。”宗助搭讪道。

“唔。”妻子没有多搭话。

看来宗助也不是想要说些什么，所以默然处之了。

过了一会儿，妻子先开口说道：“你就去散散步吧。”

这时宗助只含糊其词地“唔”了一下。

两三分钟之后，妻子把脸朝拉门上的玻璃望望，只见睡在廊尻上的丈夫不知在打什么主意，缩着双膝，身子曲得象一只大虾，而且交叉着两臂，把黑黑的脑袋埋在臂间，根本望不到他的脸。

“我说，你在这种地方睡觉是要感冒的哪。”妻子提醒丈夫注意。她的语调带有东京腔、又不象东京腔，是一种现时代女学生通用的调子。

宗助的大眼睛在两条胳膊肘之间不住地眨巴，小声地答道：“我没睡，放心好了。”

接下来又是静默。屋外响过两三次胶轮车通过的铃声后，可以听到远处的鸡啼声了。宗助贪婪地品味着阳光自然浸入新做布衣背部而透入衬衣里的暖意，同时，似听非听地注意着门外的声响。这时，他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事似的，唤问拉门里边的妻子。

“阿米，近来的近字该怎么写呀？”宗助问。

妻子闻声后，没有怎么发楞，也没有发出少妇特有的尖娇的笑声。

“不是近江的近嘛？”她答道。

“这近江的近字，我也写不出来。”

妻子把关住的拉门拉开半扇，一把长长的尺伸到起居室外，用尺的一端在廊庑上描了个近字给他看。

“是这样写的吧。”她没再说别的，把尺端停在描字的地方，入神地朝清澈的晴空眺望了一会儿。

宗助没朝妻子望，说道：“真是这么写？”他不象在说着玩，也就没露出什么好笑的样子。妻子呢，似乎对近字的事毫无兴趣。

“这天气真是好极了哪。”她带着一半自言自语的腔调说着，又继续自己手中的针黹活儿，拉门就这样开着。

这时宗助把埋在胳膊肘里的脑袋略为抬起，说道：“字这玩意儿也真是怪得难以想象。”然后朝妻子望望。

“怎么啦？”

“怎么啦？喏，即使是非常常用的字，你一时感到有点怪而产生疑窦后，就会越发糊涂。不久前，我还被今天的今字搞得不知所措，好端端地写到纸上了，凝神端详后，总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后来越看越不象个今字了。你可曾碰到过这类事情？”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有吗？”宗助用手按着脑袋。

“你真有点不正常了哪。”

“也许仍旧是神经衰弱的关系吧。”

“是呀。”妻子望着丈夫说。丈夫总算站了起来。

宗助仿佛腾越似地跨过针线盒和一些线头，把吃饭间的拉门打开，就是客堂间了。客堂间的南面有正门为障，所以眼前的这扇拉门映到一下子从阳光下跑进来的宗助的眼中时，不免有点儿寒意。宗助打开拉门，斜崖象是直逼房檐似地耸立在廊庑的尽头，竟使得上午理该晒下来的阳光也被挡住了。山崖上长着草，崖脚下没有垒石头，真有不知何时会塌下来的危险，但是说来也奇怪，倒从没听说过发生塌方的事。大概正因为如此吧，房主也就长期不予过问，听其自然。一位已在町内住了二十年之久的老土地曾在吃饭间的后门口特意就此事向宗助作了这样的说明：“当然罗，听说这儿本来长满了竹丛，而在开辟的时候，竹根没挖掘掉，